

# 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sup>\*</sup>

## ——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

蔡 昉

内容提要: 认识中国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效果的一个重要视角,是观察改革如何通过改善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和拆除体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从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梳理了国内外解析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从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充分条件、机制机理、结构视角和阶段变化等方面,尝试对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做出自己的补充。本文从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角度简述了一系列体制改革的过程和逻辑,从经验角度估算了三个产业总体、分别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揭示高速经济增长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并阐释其对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含义。

关键词: 改革效应 资源重新配置 劳动生产率

### 一、引 言

以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始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 40 年的历程。把孔子所说“四十不惑”用在这里,表明在 40 年之际对改革开放进行总结,应该与在 20 年和 30 年时不一样,更加确切的事实应该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深刻。事实上,日趋丰富的经验证据,不仅可以帮助回答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帮助解释改革方式与增长绩效及其程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藉此回答在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未来改革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如何保持和取得改革红利。

迄今,经济学中已经积累起丰富的文献探讨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来说,国内学者具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优势,着眼于对改革过程进行描述,或者以计量方式进行经验总结的文献居多。而国外除了计量研究之外,也有一些颇有影响的研究具有比较的视角,尝试把中国改革与一般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建立关联,因而得到更多的关注。后一类研究大体上遵循了三个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目标决定论。“华盛顿共识”的信奉者给出了一些先验性的体制目标模式,简单套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学者,也以西方经济发展经验武断地设定圭臬,以此来比照中国改革是否彻底,是否成功,中国的增长算不算得上是“奇迹”,有没有可持续性。例如,扬和克鲁格曼等(Young, 2003; Krugman, 2013)遵循其一贯的理论出发点和经验方法,认为中国改革期间的增长类似于多年前他们所批评的东亚经济,具有粗放性和不可持续性。这种判断完全无视中国所处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点,与他们对东亚经济的判断一样,其正确性已经为事实所否定。

这类研究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充分揭示中国改革所遵循的自身逻辑和采取的独特方式。虽然一些研究者尝试阐释中国改革方式(Lin et al., 2003; Naughton, 1996),或者在事实和比较面前承认中国改革方式的成功(Sachs, 2003),也往往不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生活得到显

<sup>\*</sup>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邮政编码: 100732。

著改善的同时却形成了巨大收入差距的矛盾现象。他们任由这种解释上的不彻底性存在,往往以“但书”的方式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列。而只有讲清楚资源重新配置过程,才可能同时解释经济增长奇迹和改善民生的事实。虽然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众多(Cai, 2016),但资源重新配置产生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却终究发挥作用。

第二个传统是制度趋同论。长期为新古典增长理论辩护的巴罗等人,把一些制度因素纳入增长回归,作为条件趋同的因素(Barro & Sala-i-Martin, 2004)。一方面,他们模型中选取的制度变量未必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对象的体制因素相一致,以至于匆匆套用所谓的趋同铁律,对中国经济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如 Barro, 2016)。另一方面,即使在其具有解释力的部分,也仅仅看到了趋同性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看不到充分条件,从而无从解释中国高速增长的源泉。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具有的有利人口条件,揭示出人口红利在增长中的作用(Wang & Mason, 2008),却终究没有讲透中国式二元经济发展的机理,未能把有利的人口结构是通过何种途径被兑现为人口红利的问题说明明白。

这类研究缺乏的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不懂得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下具有的特殊增长源泉——人口红利,特别是不了解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增长源泉的途径,则不能把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绩效与看似不可持续的增長方式之间的矛盾,做出理论上一致的说明。

第三个传统是结构演进规律论。库兹涅茨(1985)和钱纳里等(1988)开创了这个传统,揭示了以生产率提高为引导的产业结构变革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青木昌彦(Aoki, 2012)也将其应用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研究,认同中国经济经历的库兹涅茨过程。这类研究更加注重经验,较少囿于先验结论和固有成见。但是,即便这种结构演进规律被广为接受,现实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国家差异(钱纳里等, 1988),对中国的全面研究从而对独特演进道路的认识仍嫌不足。

本文着眼于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立足于中国在改革时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变化,从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角度叙述相关改革过程,从经验上揭示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效果。特别是尝试回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充分条件、机制机理、结构视角和阶段变化,及其对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含义。

## 二、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创造了长达近4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1978—2015年期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分别增长了29倍和20倍,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升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水平也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幅度得到提高,同期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很多年来,研究者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相关的经济学文献通常主要集中于回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会发生、改革如何推进,以及统计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绩效从何而来这样三个问题。

### 1. 为什么会有高速经济增长?

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就是要阐释中国经济何以在改革期间取得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即改革与增长绩效的关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增长理论文献都揭示,有利于保护产权和促进竞争的体制环境及政府职能界定,都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助于处在较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趋同(如 Barro & Sala-i-Martin, 2004)。因此,旨在找到阻碍发展的关键性并矫正之的经济体制改革,因其消除或削弱了传统体制弊端,提升增长速度的效应是可以预期的(Brandt & Rawski, 2008)。

绝大多数研究认同,这个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即通过改善微观环节的激励机制、矫正

价格信号、发育产品市场、拆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和竞争,提高了中国在这一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率并予以实现。例如,在一部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著作中,中外 45 位作者形成共识,中国经济取得的显著成就,应该归结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封闭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巨大转变( Brandt & Rawski, 2008)。

改革前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在于,一系列体制因素既损害了对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激励机制,也导致资源的低效、无效乃至错误配置。传统体制形成之初,中国总体上已经完成经济内卷化过程,即农业中积淀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二元结构社会 and 资源配置格局,本应开始以劳动力转移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然而,急于赶超工业化国家的强烈愿望,加之对工业化认识上的误导以及有限的选择空间,导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变。这种体制下资源误配的格局反过来锁定了无效的激励机制,导致低下的生产率和增长表现,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一般来说,面对一个长期缺乏激励机制从而抑制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体制,从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中微观激励不足的环节入手,容易以帕累托改进的方式推进改革,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过去近 40 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路径进行的,由此兑现了人口红利,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这就是改革解放生产力、促进增长的经济学道理。

## 2. 改革方式的中国特色

回答“如何”的问题,就是在比较中揭示中国的改革方式有何独特之处。早期的观察强调了这种改革路径注重新旧衔接,如诺顿著名的新体制“从计划中生长出来”的表述( Naughton, 1996),以及研究者普遍观察到的改革的渐进性质和着眼于增量改革的特点( Lin et al., 2003),以此区别于其他前计划经济国家的转轨,如俄罗斯和波兰采取的同时推进放开价格和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进一步,研究者也观察到,中国的改革不仅因其未导致经济增长衰退而始终保障了基本民生,改革本身也具有以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导向的特点( Cai ed., 2010)。

与此相关地,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关于中国发展的包容性问题,则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或者得出不尽符合逻辑的结论。多数学者注意到中国在居民收入整体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呈提高趋势,并迄今处在很高的水平。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5。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似乎更大。例如,着眼于更完整地获取收入分布的贫富两端数据,王小鲁( 2013) 揭示了大规模未被统计数据捕捉到的灰色收入,而甘犁等( 2012) 计算得出 2010 年的基尼系数高达 0.61。

尽管根据各类反映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指标我们应该承认,改革开放时期收入差距的确趋于扩大,并且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具有较高的收入差距水平。然而,以下几个事实不容忽略( 参见 Cai, 2016a)。首先,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各收入组的居民群体均经历了收入的快速增长。其次,那些发掘收入分组高低两个尾部极端值的做法及得出的结果,尽管对于认识和分析问题也有助益,但是并不适宜进行国际比较,因为各国收入统计均存在遗漏两端信息的问题。其实,中国收入调查中也存在着技术性问题,造成低估农户收入和高估城市居民收入,从而夸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最后,中国包容性发展的不容辩驳的证据更在于,数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创造了世界公认的扶贫成就。总体而言,中国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分别或同时通过三种形式,得以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阻碍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非农产业就业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由此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与奥托尔等( Autor et al., 2006) 观察到的美国劳动

力市场两极化趋势,即高技能型岗位和低端部门非熟练岗位增长较快,中间层次岗位相对减少,以及斯彭斯等( Spence & Hlatshwayo, 2011) 得出在 1990—2008 年期间,美国的新增就业增长缓慢且几乎无一来自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不一样,中国的非农就业大幅扩大,且在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保持平衡,在 2004—2013 年期间分别年均增长 6.9% 和 4.7%。如果考虑到这个增长速度是按照被低估了 20% 左右的 2013 年非农就业数字计算的,实际就业增长则会更加突出( 蔡昉 2016)。

第二,以 2004 年中国经济迎来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为分界( Cai, 2016a) 此前,虽然收入差距有明显扩大,但没有产生两极化趋势,各个收入组的收入水平都在提高,此后,普通劳动者工资从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自 2009 年以来各种指标都显示了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例如,在 2009—2015 年期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0.49 下降到 0.46,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从 2.67 下降到 2.38。

第三,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特别突出的做法是建立了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以及在城乡、区域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得到明显的提高( 参见 Cai, 2016a)。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改革加快推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环境也明显改善。

### 3. 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

回答“从何而来”的问题,就是要剖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什么独特的源泉,使得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且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能够在长达 40 年的时间里保持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需要经济学家突破主流分析框架的束缚,从更广的视角揭示这种增长奇迹的源泉。

中国在整个改革期间伴随着迅速而深刻的人口转变,实现了从高生育率和高人口增长率阶段到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转变,这个过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涵义。例如,王丰和梅森( Wang & Mason, 2008) 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估计出在 1982—2000 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15%。蔡昉和王德文( Cai & Wang, 2005) 的估计显示,同一时期抚养比下降对人均 GDP 增长的贡献高达 26.8%。

然而,把抚养比作为变量估计的贡献率,只能是人口红利贡献的残差,实际上,人口红利作为增长率的贡献因素,体现在几乎所有生产函数的解释变量中。一个标准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常被表述为:  $Y = A * F(K, L) = K^{\alpha} * (AL)^{1-\alpha}$ , 其中以  $Y$  表示产出( GDP) 增长,  $K$  为资本投入,  $L$  为劳动投入,又可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  $A$  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此外,经济学家还形成了一个“右手边斗士”的传统( Srinivasan & Bhagwati, 1999), 即采用增长回归方法,在公式的右手边增加各种理论上预期有意义且统计上显著的变量,如人口抚养比等。

用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现实拓展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人口红利贡献做出新的假设和解释。经济学文献采用不同方法和不同时期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虽然估计的相关系数不尽相同,但是都验证了预期中的主要生产要素投入、资源配置效率和残差所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下面,我们归纳相关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展示更全面的人口红利效应。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 1998) 早期研究发现,在 1978—1995 年期间的 GDP 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 37%,而蔡昉和赵文( Cai & Zhao, 2012) 估计的这一贡献率更高。资本投入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既算不上奇迹,也没有可持续性( 如 Young, 2003)。然而,在被包括

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sup>①</sup>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世界银行估计的(包括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劳动力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为17%,蔡昉和赵文的估计为8%,人力资本贡献率则为4%。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

第三,剩余劳动力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世界银行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劳动力剩余的农业和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后者即未被解释的因素(激励改善和技术进步等因素)贡献率为30%。蔡昉和王德文(1999)估计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

最后,在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大即意味着对创新产生更大的需求和供给力度,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个观点来自于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的最新贡献,经济学家也尝试进行了一些经验检验(如 Jones, 2002),但是,作者尚未见到以中国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成果发表。

正如人口红利体现在经济增长所有贡献因素中一样,改革时期中国经济的整个增长过程,同时是一个广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国的经验表明,除了狭义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贡献外,诸如资本积累扩大、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的数量增加等投入因素,也倾向于主要配置在生产率更高和增长速度更快的非农产业中。因此,考察劳动力重新配置过程和结果,无疑是认识中国改革促进增长的一个重要视角。

### 三、劳动力市场改革

有利于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并获得重新配置的改革,涉及微观环节和宏观层面的诸多领域。简单按照时间顺序叙述这些改革,难以在理论逻辑上突出某项改革在资源重新配置方面的意义。总体来看,在改革期间,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拆除一系列制度障碍,使劳动者能够依据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市场信号,离开原来所在低生产率的就业领域,在地域上和产业间流动,并进入新的、生产率更高的就业领域。因此,按照经济理论预期和经济活动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既反映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也描述个体选择行为的结果,本部分将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着眼,简述迁移者如何获得“退出权”、“流动权”和“进入权”,以此记录这一改革的历程,评价改革效果。

#### 1. 过剩劳动力如何被释放?

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是赋予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中退出权利的关键改革。早在官方允许之前,一些边远的贫困农村就悄悄试验包产到户,而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种改革方式逐渐得到默许、认可直至推广。到1984年底,全国农村的全部生产队和98%的农户都采取了家庭承包制的经营形式,随后人民公社体制也被正式废除。实行家庭承包制的直接目的,是改进对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激励机制,是在保证国家和集体权益的前提下,给予农户经营自主权和剩余产品索取权。研究者对于这一激励机制改善刺激农业增长的显著作用进行了检验。

<sup>①</sup> 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资本回报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Bai et al., 2006);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则迅速下降(白重恩和张琼, 2014)。

然而,按照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从随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这一改革的核心更是赋予了农户配置生产要素的自主权。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被严格限制了就业地点(所在生产队)、从事产业(农业,主要是种植业甚至仅仅是粮食种植)和劳动时间(由生产队直接规定),资源错配因此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被固化住。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在确保国家以征农业税和统购的形式,集体以统一提留的形式,继续掌握部分农产品的控制权之外,农户可以自主选择种植和经营内容,以及自主支配劳动时间。有了这两点,在改革使得农业劳动力剩余日益显性化的情况下,劳动力和其他投入要素就开始了重新配置。

## 2. 产业和地域间流动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和票证制度“三驾马车”,把农村劳动力严格限制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不允许进行产业转移和地域流动。随着微观激励的改善,劳动力剩余被显性化。据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大约有 30%—40% 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人数高达 1 亿到 1.5 亿(Taylor, 1993)。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促进了一系列体制性障碍的逐步拆除,并最终使劳动力得以重新配置。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先后经历了从“以粮为纲”到多种经营,从单一的种植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农业到乡镇企业,从“离土不离乡”到进入小城镇直至大中城市的非农产业。

随着人民公社被废除,以及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最初被允许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突破了就业的地域限制。进一步,政府又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第一次突破了城乡就业藩篱。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就业也就不再有技术上的障碍。虽然迄今户籍制度仍然存在,按照户籍登记地将公共服务供给割裂,农民工及其家属尚不能在打工地均等地享受子女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但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制度障碍已经显著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改革也经历了深刻的改革,正面临着最后的突破。

## 3. 打破进入壁垒

在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条件下,农业转移劳动力只能获得边际上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例如,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企业仍是转移劳动力的主要载体。1992 年以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开始吸纳大规模的跨地区迁移劳动力,形成了最初的民工潮。进一步,在 90 年代末,城市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改革,最终拆除了劳动力跨地域、跨产业重新配置的进入障碍。

虽然从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开始,企业就被赋予了用工自主权,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国有企业管理者受到种种制约,并不愿意实际上也无法行使自行解雇和雇用职工的权力。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在遭遇严峻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用工制度改革,从此打破了存续几十年的就业“铁饭碗”。一方面,下岗职工在获得一定社会保障的条件下,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另一方面,新成长劳动力也需通过自主择业,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逐渐形成。这同时为农民工创造了日益均等的竞争就业机会,也使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进入到存量领域。

# 四、劳动力重新配置

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变化的关键,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我们可以将此过程称作“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青木昌彦(Aoki, 2012)根据东亚(主要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经验做出发展阶段划分时,提出了一个以产业结构变化为特征的库兹涅茨阶段(或简称 K 阶段)。其他学者也承认,劳动力转移形成资源重

新配置效率,是亚洲经济体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McMillan & Rodrik ,2011) ,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Bosworth & Collins ,2008) ,并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 如都阳 2014) 。

相关领域的改革解除了一系列制度障碍,促进了劳动力在产业和地区之间,遵循生产率提高的方向进行重新配置。这使得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库兹涅茨过程,即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了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 40 年的经济改革成果,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机结合。下面,我们从经验上观察这种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

按照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发展、人口转变以及相伴随的就业扩大,中国城乡就业总规模从 1978 年的 4.02 亿增加到 2015 年的 7.75 亿。与此同时,作为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果,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 70.5% 下降到 28.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 17.3% 和 12.2% 分别提高到 29.3% 和 42.4%。在 GDP 总量高速增长、非农产业增加值更快增长以及劳动力重新配置条件下,虽然三个产业生产率及其提高速度不同,总体劳动生产率却得以大幅度提高。不过,在使用数据进一步展示这个过程和结果之前,我们需要对官方统计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并形成一套与官方数据对照的数据系列。

首先,对 1990 年以前的城乡就业总规模进行一定的平滑化处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就业总数在 1990 年有一个异常的跳跃,从 1989 年的 5.53 亿一下子提高到 1990 年的 6.47 亿,提高幅度为 17%。这个陡增的就业数并非一年里实际发生,而是根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调整的结果。既然没有充分的依据解释和恰当处理这个异常值,我们将其进行平滑处理,即把该年度就业数的一次性陡增,分摊到 1978—1989 年期间各年之中,而在 1990 年之后各年仍然采用官方统计数据。

其次,按照更加接近真实情况的假设,把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做了调低处理。有几个考虑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官方数据显示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 参见 Cai ,2016b) 。其一,农业中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判断,不能与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事实相互一致。其二,中国在其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剧烈变化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下降的速度,还不到日本和韩国相应时期的一半,也难以在逻辑上说得通。其三,以往的研究提供了诸多证据,或者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异常地高于理论预期( IMF ,2006) ,或者认为统计数据中显示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从早年起就被高估了( 如 Rawski & Mead ,1998) 。

此前的一项研究( Cai et al. ,2013) 通过合理修正国家统计局关于农业劳动力的定义,重新估算了 2009 年的实际农业劳动力,表明官方数字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估了约 13.4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布兰德和朱小东使用其他数据来源所做的估计高度一致( Brandt & Zhu ,2010) 。本文利用这种结果,把 2009 年官方数据高估的幅度平均分摊到之前和之后的各年之中。具体来说,我们以 2009 年为基准,把认为高估的农业劳动力均等地分摊到之前各年份中,同时按照认为高估的程度重新调整之后各年份数据。由此得出 2015 年实际务农劳动力比重为 18.3%,至少比官方数字低 10 个百分点。统计数据与调整过数据之间的差额,则按照对应的权重分别摊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年数据中。

这样,我们可以把官方统计数据和调整过的数据,分别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各类收入分组国家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表 1) 。从发布的统计数据看,中国三个产业间的就业分布仍然具有非典型化结构特征,特别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偏低。相比而言,调整过的数据结果则更加符合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效果的预期,但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相比,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尚低。

表 1

三个产业劳动力分布的国际比较

单位: %

国家和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国(统计数据)	28.3	29.3	42.4
中国(调整数据)	18.3	33.4	48.3
中国(ILO)	28.9	23.7	47.3
世界平均	29.5	21.5	48.9
低收入国家	68.5	8.3	23.2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40.4	21.3	38.3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23.9	24.0	52.1
高收入国家	3.1	22.5	74.3
东亚高收入经济体	4.1	35.3	60.3

注: 前两行系分别按统计数据和调整数据口径的数值, 其他则是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模型估算的数值。

资料来源: ILO(2017)、国家统计局(历年)及本文估计。

## 五、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其源泉

在考察了劳动力重新配置过程及效果之后, 为了计算总体和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我们利用分产业的增加值缩减指数, 计算出三个产业各年度的实际增加值。由于进行缩减之后的各产业增加值之和大于实际 GDP, 我们用前者作为各年度实际 GDP 的代理数据。这样, 我们就有了两套关于就业总数、分三个产业就业数、分三个产业实际增加值及其加总而成的 GDP 时间系列数据, 并以此分别计算出总体劳动生产率和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如图 1 所示, 按照统计数据口径, 在 1978—2015 年期间,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劳均 GDP) 实际提高了 16.7 倍, 其中第一产业提高了 5.5 倍, 第二产业提高了 13.5 倍, 第三产业提高了 5.2 倍。根据调整过的数据计算结果, 总体变化与此一致, 只是显示出第一产业有更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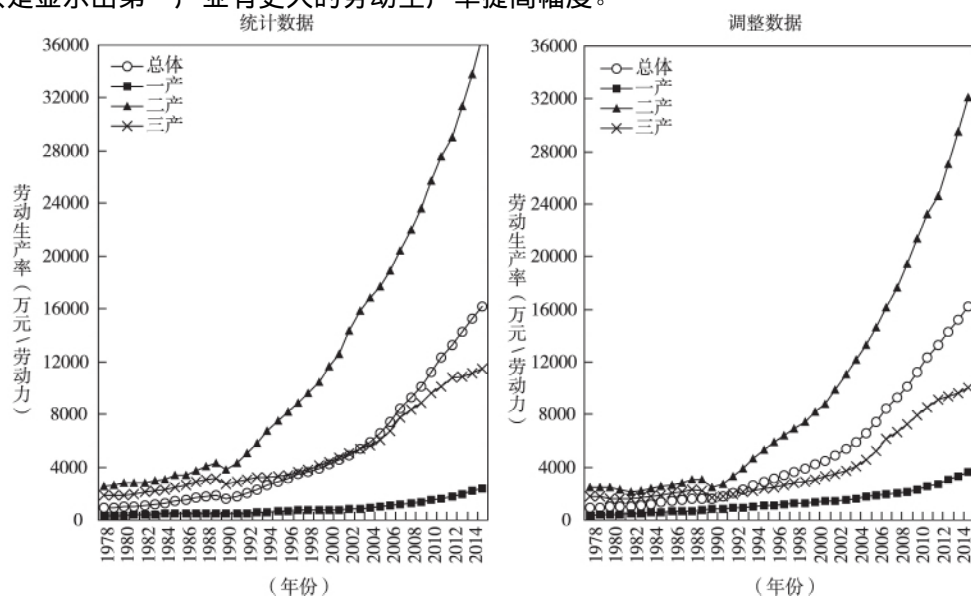


图 1 总体和分产业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和作者的估算。



值得指出的是,经历了近40年产业结构调整 and 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三个产业之间,特别是农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却没有缩小。从统计数据看,1978—2015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第二产业百分比从14%减小为6%,相当于第三产业的百分比从19%提高到28%。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第二产业百分比从73%缩小为31%。即使从调整过的数据看,这个生产率差距变化也大体相当。

分解劳动生产率源泉,观察其各个构成因素及其相对贡献,通常有两种方法,分别对应不同的关注重点。第一种是按照功能性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比和人力资本等因素贡献。例如,高路易(Kuijs, 2010)的估计显示,1978—1994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4%,上述三种因素贡献分别为46.9%、45.3%和7.8%,而到1995—2009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6%,三种因素贡献分别为31.4%、64.0%和3.5%。第二种是按照结构性分解为不同产业或行业的贡献,如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后一种计算要求的数据比较易得,估算方法比较简单,结论直观、简洁,使用得当的话,其解释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涵盖前者。

在梯莫尔和吉尔迈(Timmer & Szirmai, 2000)对亚洲一些经济体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表现进行比较研究时,提供了一个分解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的计算公式,可供我们借用来分解三个产业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以及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间转移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即重新配置效应。公式如下:

$$LP^t - LP^o = \sum_{i=1}^3 (LP_i^t - LP_i^o) S_i^o + \sum_{i=1}^3 (S_i^t - S_i^o) LP_i^o + \sum_{i=1}^3 (S_i^t - S_i^o) (LP_i^t - LP_i^o)$$

其中,  $LP$  为劳动生产率,下标  $i$  为1、2、3,分别代表三个产业,  $S_i$  代表某个产业的劳动力比重,  $o$  和  $t$  分别代表考察的起始年份和终止年份。

该公式等号左边表示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等式右边的第一项表示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总体的贡献,第二项和第三项代表产业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其中第二项表示静态转移效应,即劳动力向初始年份劳动生产率较高产业转移的贡献,第三项表示动态转移效应,即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较快的产业转移的贡献。

我们按照统计数据进行整个时期和分时期计算,而鉴于调整过的数据已经进行平滑化处理,这里仅用来进行这个时期的计算,不再用来进行分期计算(表2)。根据前述已知,在三个产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改革之初皆显著高于第一产业,而且在整个改革期间提高幅度大于第一产业,其中第二产业表现更为突出。计算结果显示,在1978—2015年期间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大于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结构变化效应中,动态效应是主要的贡献因素,静态效应贡献作用较小。

表2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其贡献分解 单位: %

年份	劳动生产率总增长	产业内贡献率	结构变化贡献率	其中:静态效应	动态效应
1978—2015	1671.3 (1671.3)	55.1 (56.0)	44.9 (44.0)	4.6 (5.5)	40.2 (38.6)
1978—1990	77.5	60.8	39.2	25.8	13.4
1991—2003	205.2	86.2	13.8	7.0	6.8
2004—2015	173.5	66.9	33.1	15.9	17.2

注: 括弧内数字系根据调整数据估算的结果。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及作者计算。

在对 1978—1990 年、1991—2003 年和 2004—2015 年三个时期分别进行计算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结构变化效应比较显著,其中在第一个时期的结构变化因素(39.2%)中,静态效应贡献突出,为 25.8 个百分点。而在中间那个时期,产业贡献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在第三个时期,结构变化贡献率再次回到较高水平上。

为了进一步观察三个产业分别对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做出的贡献,我们可以借鉴博斯沃思和科林斯(Bosworth & Collins, 2007)的分解方法。这一方法能够单独显示各产业的贡献,并且可以把三个产业对总体劳动生产率贡献之外的残差,作为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的一种度量。其计算公式可以表述为:  $G_o^t = \sum_{i=1}^3 G_i^o S_i^o + R$ , 其中  $G_o^t$  为考查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标  $i$  为 1、2、3,分别代表三个产业,  $S_i$  代表某个产业的增加值比重,  $o$  和  $t$  分别代表考查的起始年份和终止年份。 $R$  是一个残差项,相当于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未被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解释的部分。

利用这种稍显粗略的方法,我们估算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劳均增加值)分别提高以及残差项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劳均 GDP)增长率的贡献百分点(表 3)。我们仍然把改革以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代表改革释放出资源配置改进潜力时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时期,以及刘易斯转折点以后的时期。同样,我们主要使用官方统计数据计算,调整过的数据仅用于观察整个时期的情况,而不用来进行分期计算。

表 3 三个产业及重新配置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单位: %

年份	年均增长率	一产贡献率	二产贡献率	三产贡献率	配置贡献率
1978—2015	8.08 (8.08)	17.73 (21.86)	44.22 (42.53)	15.39 (14.53)	22.66 (21.08)
1978—1990	4.90	15.65	34.46	16.57	33.32
1991—2003	9.75	7.44	61.30	16.71	14.55
2004—2015	9.58	6.68	48.69	20.27	24.36

注: 括弧内数字系根据调整数据估算的结果。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6》及作者计算。

从表 3 的计算结果可见,1978—2015 年期间总体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8.1%,而分期看,第一个时期增长较慢,在随后的两个时期速度明显提高。其中第一产业的贡献稳定下降,各个时期皆不到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贡献大幅度提高,成为各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贡献部门;第三产业贡献率也有所提高,但贡献率显著低于第二产业;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也很显著,但是在中间的那个时期表现较差。使用调整过的数据对整个时期进行计算的结果,没有发现显著的不同。

## 六、结 语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在诸多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逐渐清除了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使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剩余劳动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获得了对原有配置格局的退出权、遵循生产率原则重新配置的流动权,以及在生产率及其增长速度更高部门的进入权。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到最大化积累的同时,劳动力重新配置明显改善生产率,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

本文从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角度,总结了相关领域的改革过程,也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改革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揭示出三个产业的总贡献、分别贡献以及劳动力在其间进行重新配置的贡

献。虽然这个分析路径只是对改革效应进行研究的方法之一,不能替代在其他框架下所进行的研究,但是,一方面,资源重新配置视角是经济发展研究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也从自身角度印证了其他研究的一些基本结论。更重要的是,资源重新配置视角的研究,有助于在资源禀赋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认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源泉。

随着中国进入并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力供求关系从量变转变为质变。继2004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以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人口抚养比下降趋势触底为标志,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条件发生了变化,高增长赖以实现的人口红利开始加速消失,依靠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支撑的增长模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驱动。与此同时,作为可供转移劳动力总数减少的结果,以往那种显而易见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已经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提高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增大。<sup>①</sup> 本文分解得到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可以为探寻未来的生产率提高潜力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个产业之间,特别表现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巨大这一事实,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极大的提高潜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依然可期。随着农村16—19岁年龄段人口于2014年以后进入负增长,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转移的速度明显放慢(Cai et al., 2016)。但是,既然存在产业间的生产率差异,通过进一步改善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环境,克服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不可持续因素,如过度依赖第二产业,以及该产业过度依赖资本劳动比的提高等,可以保持整体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高。

首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激励力度。比较显示,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是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和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还可以作一个有意义的比较,以便揭示中国具有的进一步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昭示今后一个时期的结构变化目标和任务。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79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组,预期将在未来数年中跨越12600美元这个从中等偏上收入组到高收入组的门槛,农业劳动力比重需要对应着这个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继续降低。2015年人均GNI在高于中国与上述门槛水平之间的国家共有17个,剔除其中3个数据缺失的国家后,仍可以看到,从人均收入9200美元的加蓬到人均收入12760美元的克罗地亚,14个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的算术平均值为12.8%(ILO, 2017)。向这个结构水平趋同,是中国未来几年结构调整的方向。

其次,突破超小农业经营规模的制约。伴随着劳动力转移,农业中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并日益具有节约劳动的倾向。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经营具有规模超小的特点,户均土地面积仅为0.6—0.7公顷,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所有者”规模(2公顷)的1/3,导致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中出现了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阻碍农业自生能力的提升(蔡昉和王美艳, 2016)。打破这个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障碍的关键,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集中,显著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第三,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持续性。在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情况下,企业更多通过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如果这个进程不能与工人素质等因素保持协调的话,资本劳动比提高过快则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这方面日本提供了教训。在丧失人口红利支撑之后,日本经济过度依靠资本深化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来保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劳动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85—1991年期间的51%提高到1991—2000

<sup>①</sup> 例如,世界大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 2015)观察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生产率赶超的势头有所式微,并且得出2007—2014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略有减慢,而全要素生产率减速则超过一半的结论。

年期间的 94%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则从 37% 降低到 - 15% ,造成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 ( APO ,2008) 。

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减慢的情况下 ,第二产业内各行业之间以及一个工业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 ,是推动创新发展的动力 ,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只要同一行业企业间存在着生产率差异 ,则意味着生产要素尚未达到最优配置。因此 ,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结束之后 ,生产率的提高更多是通过企业的进入、退出或新生、死亡 ,即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按照把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率企业流转的方式推动。研究表明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此类源泉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 1/3 至 1/2 ( Foster et al. ,2008) ,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潜力仍然巨大 ( Cai ,2016a) 。

最后 ,坚持资源重新配置的生产率原则。现实中 ,三个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高 ,并非按照第一、第二和第三这样的排序顺序。总体来说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虽然高于第一产业 ,却大大低于第二产业。例如 ,以调整过的数据计算 ,2015 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 4.9 倍 ,却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 31% 。因此 ,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服务业无疑导致生产率提高 ,但是 ,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 ,却未必带来生产率的总体改进。近年来第三产业在就业比重提高的同时 ,劳动生产率却出现徘徊的局面。因此 ,提倡发展服务业并提高其比重 ,需要遵循生产率提高原则推进 ,重点放在那些具有生产率高且增长迅速的现代服务业上面。

#### 参考文献

- 白重恩、张琼 2014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第 10 期。
- 蔡昉 2016 《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11 期。
- 蔡昉、王德文 1999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 10 期。
- 蔡昉、王美艳 2016 《从穷人经济到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中国农业提出的挑战》,《经济研究》第 5 期。
- 都阳 2014 《劳动力市场变化与经济增长新源泉》,《开放导报》第 3 期。
- 甘犁、尹志超、贾勇、徐舒 2012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2012》,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思·赛尔昆 1988,《发展的型式 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
- 世界银行 1998 《2020 年的中国: 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王小鲁 2013 《国民收入分配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 西蒙·库兹涅茨 1985 《各国的经济增长: 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商务印书馆。
- Aoki ,Masahiko 2012, “The Five 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 Japan , and Korea” , in Aoki ,Masahiko ,Timur Kuran ,and Gérard Roland ( eds. )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3—47.
-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 APO) 2008 ,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08 ,Tokyo: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 Autor ,David H. ,Lawrence F. Katz ,and Melissa S. Kearney 2006,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 S. Labor Marke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86.
- Bai ,Chong-En ,Chang-Tai Hsieh ,and Yingyi Qian ,2006,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755.
- Barro ,Robert J. ,2016,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pplied Especially To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872.
- Barro ,Robert J. ,and Xavier Sala-i-Martin ,2004 ,Economic Growth (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 London: The MIT Press.
- Bosworth ,Barry ,and Susan Collins ,2007,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NBER Working Paper ,12943.
- Brandt ,Loren ,and Thomas G. Rawski ,2008,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Brandt ,Loren and Thomas G. Rawski ( ed )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ndt ,Loren ,and Xiaodong Zhu ,2010,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Working Paper ,No. 395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of University of Toronto.
- Cai ,Fang ,2010 ,Transforming the Chinese Economy ,1978—2008 ,Leiden • Boston: Brill.
- Cai ,Fang ,2016a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 Dividend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Cai ,Fang ,2016b, “From Quantitative Issues to Structural One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Labor Market” , *China Economist* , Vol. 11 , No. 1 , 92—111.
- Cai ,Fang , and Dewen Wang ,2005,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 in Garnaut ,Ross and Ligang Song ( eds ) ,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 Cai ,Fang , Guo Zhenwei , and Wang Meiyang ,2016, “New Urbanisation as a Driver of China’s Growth” , in Song , Ligang , Ross Garnaut ,Cai Fang and Lauren Johnston ( eds ) , *China’s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 Vol. 1: Reform , Resources , and Climate Change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China ) , 43—64.
- Cai ,Fang , and Wen Zhao ,2012,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 in Aoki , Masahiko and Jinglian Wu ( eds ) ,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Cai ,Fang , Yang Du , and Meiyang Wang ,2013, “Demystify the Labor Statistics in China” , *China Economic Journal* , Vol. 6 , No. 2—3 , 123—133.
- Foster , Lucia , John Haltiwanger , and Chad Syverson ,2008,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 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98 , 394—425.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ILO ) ,2017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 KILM ) ,ILO Official website: <http://laborsta.ilo.org/> , downloaded in April 22 ,2017.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 ) ,2006 ,Asia Ris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Chapter 3 o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September ) , 1—30.
- Jones ,Charles ,2002, “Sources of U. S. Economic Growth in a World of Idea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92 , No. 1 , 220—239.
- Krugman ,Paul ,2013, “Hitting China’s Wall” , *New York Times* , July 18.
- Kuijs ,Louis ,2010, “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 ,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
- Lin ,Justin ,Fang Cai , and Li Zhou ,2003 ,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revised.
- McMillan ,Margaret S. , and Dani Rodrik ,2011,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 NBER Working Paper , No. 17143.
- Naughton ,Barry ,1996 ,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wski ,Thomas , and Robert Mead ,1998, “On the Trail of China’s Phantom Farmers” , *World Development* , Vol. 26 , No. 5 , 767—781.
- Sachs ,Jeffrey ,2003 , *Lessons for Brazil from China’s Success* , Transcript , São Paulo , November 5.
- Spence ,Michael , and Sandile Hlatshwayo ,2011, “The Evolving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the Employment Challenge” , Working Paper , 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March.
- Srinivasan ,T. N. , and Jagdish Bhagwati ,1999, “Outward-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Revisionists Right?” ,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s , No. 806 , Yale University.
- Taylor ,J. R. ,1993, “Rural Employment Trends and the Legacy of Surplus Labor ,1978—1989” , in Kueh ,Y. Y. and R. F. Ash ( eds. ) , *Economic Trend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Post-Mao Reform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Conference Board ,2015, “Prioritizing Productivity to Drive Growth , Competitiveness , and Profitability” ,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productivity-competitiveness/> , downloaded on March 17.
- Timmer ,Marcel P. , and Adam Szirmai ,2000,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n Manufacturing: the Structural Bonus Hypothesis Examined” ,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 No. 11 , 371—392.
- Wang ,Feng , and Andrew Mason ,2008, “The Demographic Factor in China’s Transition” , in Brandt , Loren , and Thomas G. Rawski ( ed ) ,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Alwyn ,2003, “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111 , No. 6 , 1220—1261.

## Reform Effects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Labor Reallocation

CAI Fa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resulting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have been highly praised by economists worldwide. However, the literature does not fully recognize the sourc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Whether they do not know or are unwilling to admit the dual economy development characterizing Chinese growth in the period, economists who believe in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growth have either failed to foresee Chinese success or encountered the scholarly dilemma of understanding the coexistence of unprecedented growth performance and a widening income gap. Insuffici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t will lead them to incorrectly predict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reform and unprecedented growth performance as a key to dispel common misunderstandings. To do so requires investigating processes in which reforms improve incentives, correct pricing signals, and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enhance resource re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therefor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reallocation of increments and stock of production factors, especially of labo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conomics literature on China's reform and its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y resulting from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mechanisms, structural perspective, and changed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o get a real idea of China's reform and growth experiences, one ought to give up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is widely used to explain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of Western economies and to set sights on China's unique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its change. In light of this, the paper explains how reforms have helped to reallocate labor to facilitate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is paper describes system reforms in related areas that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focusing on preventing laborers from exiting low productivity sectors, migrating between sectors and regions, and entering into high productivity sectors. Applying the methodology of previous research, the paper re-estimates the amounts and relative shares of labor in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s and finds that the labor share of agriculture is 10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than indicated by official data. It calculates th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of the economy as a whole and by sector. To reveal the effect of resource reconfiguration on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paper further calculat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ree sectors, both as a whole and separately, as well as the contributions of sectoral changes to the overall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1978–2015, 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s a whole increased by 16.7 times, while it increased by 5.5 times in the primary sector, 13.5 times in the secondary sector, and 5.2 times in the tertiary sector. To the overall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three sectors together contribute 56%, with the secondary sector being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and that labor reallocation across sectors—namely, structural change effects—contribute 44%. In dividing the structural change effects into a static shift effect and a dynamic shift effect, the former contributes 5 percentage points and the latter 39 percentage points.

Overall, the success of China's reform is reflected in not only the fast growth of GDP, but also structural change and sharing by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through employment expansion and labor reallocation following lab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characterized by the rapid disappearance of a demographic dividend, (1) facilitating the *hukou* system reform will provide incentives necessary for labor transfer, (2) expanding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will enhance labor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and in turn support labor transfer, (3) increas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ill sustain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industry, and (4) industrial structural adjustments should follow productivity enhancement principle.

**Keywords:** Reform Effects; Resources Reallocation; Labor Productivity

**JEL Classification:** O47, O53, J61, P23

(责任编辑: 宏 亮) (校对: 张 涵)